

人类的本质：动物 + 文化

引 论

对人而言，可能没有比认识其自身更为重要的问题了。然而，恐怕也没有比认识人自身更为艰难的问题了。

通常，人们往往好从古希腊文明的阿波罗庙宇所镌刻的“理解你自己”的神谕以及美妙的斯芬克斯之谜谈起人类对自身本质的认识。其实，从人类具备了智慧的远古时代，人们的头脑中便萌发形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是怎么一回事？随着人类的进步，这个诱人的、奇妙的，也是艰涩的问题始终与人类相伴随。尽管人类的智慧经历了漫长而又性质不同的飞跃，人们却始终探寻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却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使人们都感到满意的答案。只要人类存在着，这个有关人类本质的问题就不会得到完全解答。

对于“人是什么，人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人们不懈地探索着，试探着提出了

一个又一个的答案。然而，这些答案却一个又一个地被抛弃、被超越。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是这个问题高深莫测吗？还是根本就没有答案呢？在习惯于追求最后答案的人们看来，这的确是难以理解的。

实际上，“人是什么，人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犹如人类的一个影子，它与人类形影不离。每当人类向前取得了新的进步，这个问题也会伴随人类而向前推移，形成新的更深的含义，摆在人类智慧的面前去要求新的解说。于是，问题依旧而含义常新、解说常新。显然，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人类的进步，理应包括对自身本质认识的进步。没有对人类自身本质认识上的进步，这在人类进步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推进的，与这个历程相伴随，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要不断向前推移。人类历史不停止，对自身的认识自然也不会停止，这就必定形成永无圆满解说的结果。这个事实表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满足、不圆满，正是人类不断进步的象征。这决不是什么令人遗憾的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也只能是这样：以时代所赋予的知识和所提出的问题为依据和目标，努力推进对人类本质的认识，以期达到一个时代所允许、所要求的高度。

在当代，可能是由于科学文化蓬勃发展之故，人们面前的科学认识任务太繁重了，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太疲乏了，同时人们取得的生活实惠也太多了，人们开始变得玩世不恭。许多问题都似乎变得微不足道，特别是那些看来有些“老化”的问题，由于与生活实惠没有直接联系而被搁置一旁。像“人是什么，人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问题，似乎早已解决而不言自明，又似乎玄妙无穷而无法寻求，对它是否有兴趣似乎对现实生活影响不大。于是

乎对它问津的人也越来越少。

从今天的人类生活看，从深层次的人类趋势看，“人是什么，人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不是淡化以至消失了，而是更加尖锐、更加突出了。今日之现实生活，今日之人类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从根本上反思人类自身，以求获得对人类本质的更深入更全面的揭示，更能动地把握人类的根本走向。

自人类历史进入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实现了难以置信的长足发展。遨游太空、复制生命、控制核能、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新成果，刷新了人类文化历史，为人类历史掀开了灿烂辉煌的一页。人们凭直觉相信：科学技术会把人类带进一个天堂般的时代。人们陶醉了，因而人们也更加近视了：人们以为物质财富的进步是科学技术带来的最大乃至惟一的进步，追求物质享乐被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乃至惟一的目的。这种陶醉，这种近视，显然起因于一种很深的人类本质观。在这种人类本质观看来，人乃是一种动物，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动物。既然人是一种动物，那么，追求生命上的享乐也就是自然的了。正是由于这种人类本质观作为思想大背景，才形成了科学发达、物质财富发达而精神颓废的结果。

由于智能机器的出现与发展，给人类智力上的解放开拓了一条新路。然而在如何对待智能机器的问题上却产生了巨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智能机器永远只能是人的工具，它只能帮助人而不能改变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智能机器将发展成一种独立存在，它将统治人、压迫人，把人赶进动物园。这两种对立意见还进一步形成了两种实践态度：前者希望大力发展智能机器，但限制它对人的改变作用；后者恐惧智能机器，抵制其正常发展。尽管这两种意见表面上极不一致，但其骨子里却包含着相同的认识背景：

都不曾考虑一下人与智能机器是否有内在联系，都不曾考虑人是否会发生相应变迁。为什么不能跨出这一步呢？原因仍在于把人仅看成动物。科学的发达并非仅仅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享乐，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困难。人口的急剧膨胀，资源的短缺，能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出现等等事关全球的大问题，把人类搅得坐卧不安。人们开始发出惊呼：人类发展的极限来到了，人类决不会不断升华。人类能摆脱这些困扰吗？怎样才能达到新的彼岸呢？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难就难在这是一些联系着对人类根本认识的问题。显然，简单地罗列材料对于解决问题无济于事。一头扎进问题之堆，也只能让问题牵着鼻子走。这里的要害仍然在于人类本质观。

由此可见，热闹的现实生活并不是肤浅的，肤浅的只能是人们的思想。现实生活及其未来发展迫使我们不得不再次考虑：人是什么？人是怎么一回事？关于人是什么，尽管古往今来有诸多不同的说法，但本质上只有一个，这就是：人是一种特殊动物。至于如何“特殊”，则各说不一。有的说“人是一种智慧动物”，有的说“人是一种会使用工具的动物”，还有的说“人是一种理性动物”、“文化动物”等等。时至今日，人们仍普遍坚持这样一种人类观：人是一种高级动物。在本书中，我们则要反复论述这样一种新人类观：人是动物与文化的统一性存在。这就是说，人并不是一种动物或“特殊动物”，而是动物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比动物乃至生物更为高级的物质形态，它的特征便是：动物+文化。人是一种新的更高级的复合体、统一体。

新人类观与传统人类观有着巨大的区别，它将使我们对人类自身的一系列认识有所更新，因此，也将遇到更多的理论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对新人类观有一个较为系统的阐述。

第一章 人类的起源与文化的产生

我们说人是动物与文化的统一性存在，这决不是信口开河，而是通过多方面考察才得出的结论。在这里，我们首先考察一下人类的起源。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正是文化的产生，形成了古猿向人的转变。

古猿演变中的困难

关于人类起源于古猿这一点，现在似乎已没有什么疑问了。然而，人类起源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仍在不断地发问：古猿为什么要变成人而不是别的东西呢？古猿变人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提出推进了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清楚地把人类的“动物+文化”的本质揭示出来。这是因为，古猿演变中的困难正是导致文化产生和人类起源的直接历史成因。

物质形态进化的历史表明，物质体的性能在物质形态的进化中是一个能动的活跃的因素，物质体的结构则相对稳定；物质形态进化的方向就是在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物质体的性能，使之能同周围世界发生日益高级的联系与作用；为了保证物质体性能的提高，物质体结构必须不断发展变化，结构的发展服从性能的发展是一条绝对的法则。

古猿向人的转变，实质上是进一步提高物质活动性能的结果。古猿向人的转变，也是在性能与结构这对基本矛盾的推动下进行的，只是这个基本矛盾在人类祖先的身上有着活生生的特殊表现。

人类和古猿的区别，有物种关系方面的（即人与猿属两类不同性质的物质形态），也有群体形式方面的。恩格斯指出：“只有—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样。”^① 恩格斯围绕生产对人和古猿的区别作了大量的重要论述，主要是物种关系方面的。当然，研究古猿变人务必牢记：“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② 古猿的动物群是怎样发展成人类社会的呢？恩格斯是在首先考察了人与古猿在物种关系方面的转变之后才去论及社会的，他说：“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③ 所以，古猿向人的转变首先是物种关系方面的转变，这也是人与古猿区别的要害。当我们探求古猿本身的内在矛盾性时，首先涉及到的也就是人与古猿在物种关系上的区别。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20 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51 页。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53 页。

恩格斯围绕生产阐明人与古猿在物种关系上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手足分工、制造工具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劳动活动。二是语言的产生、大脑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思维和意识活动。这两个特征都是在物种关系上人和古猿从机能到结构的根本区别。研究古猿变人的内因，就是研究人类的这些根本特征是由于什么样的内在矛盾性而产生的。就劳动与思维而言，劳动的产生在先，它是人与古猿区分开来的最基本和最先的标志，思维则是在劳动的推动下形成的。所以，探讨人类起源时，关键是从劳动的发生入手。

微生物由于其机能发展的局限性所决定，它的机体结构的进化受到限制，因此始终处于生命物质发展的最低水平。植物也由于其机能的特殊性所决定，在生物进化道路上分化为又一大分支，处于生物进化的中等水平。惟有动物不同，它以“动”为其机能发展方向，始终围绕着如何提高机体的活动而进化，所以获得了高度发展，成为生物进化的主导力量和最高代表。

动物机体的机能与结构的矛盾运动，造成了动物的进化，这主要就是机体的进化、器官的进化。在 7000 万年前白垩纪时，地球上出现了灵长类动物。灵长类的特点是四肢较灵活，保留五趾的形式，大拇指（趾）与其他指（趾）分开，便于攀援和抓握物体。灵长类的脑颅也较大，眼睛也很大，具有立体视觉的能力，眼眶与颞区之间有一骨隔开。到了 5000 万年始新世晚期，灵长类从原始的狐猴中进化产生了原始的古猿。这就是人类的祖先。

由于长期的进化，古猿的前肢与后肢已发生了初步分化，在必要时能够作短时间的直立，并能用两脚在地面上行走若干步。古猿的前肢比后肢长，这是与它们“臂行”的行动方式有关，它们用一只手抓住树枝，摆动身体，再用另一只手抓住另一树枝，这

样交替来移动身体。前肢由于活动的需要，已向专门化方向发展，拇指与四指形成分离，抓握东西的能力显著见长，经常用于寻找食物，抵御敌害等活动。后肢趾较长，拇指与其他四趾也能自由地分开并相对，因此后肢也能抓握物体，这种结构同样是由于树丛生活而形成的。

本来，古猿都生活在茂密的森林中，偶尔也到林间的草地上活动。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使森林地区减缩和稀疏，树丛间的空隙地带随之增多和扩大，促使古猿经常到地面上来活动，使古猿变得越来越灵活。第三纪中期，发生了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地球的许多部分发生断层和上升运动而形成众多山脉，一些地区的气候变得干燥起来，森林逐渐凋萎消失并为草原所代替，加上种内的生存斗争，迫使古猿中的一支踏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古猿从原先的树居生活逐渐改为地面生活后，在新的生活条件下，获取食物的方式不同了，获取食物的困难比在森林中大多了，地面上的敌害也更多。根据现有的化石材料看，这种古猿既没有锐利的牙齿，又没有强大的体力。在这种环境中，单单依靠身体的肉体器官机能已不能保障生存。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机体变异而适应新环境呢？也不行。像古猿这类高等动物已不可能较快发生向某个方向的特殊变异，并且这种纯肉体结构的变异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是因为，古猿要在这种新环境中生存下去，不能仅仅依靠适应，而必须对环境产生能动的改造作用，以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的条件。

要对环境发生改造作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要求机体器官不是以一种有限的方式，而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环境发生作用，其广度和深度都是以往的活动所无法比拟的。例如，要既能与各种强大的敌害斗争，又能克服自然的各种限制获取各种食

物和生存条件；既能切割和剥削，又能刺戳和挖掘，等等。但是，任何机体的器官都是有限的，任何器官的机能又是特定的。如昆虫和鸟类要飞就需长有翅膀，鱼要游水就要长有鳍。所以，肉体结构不能允许机能发展到上述这种水平，这正是连高等动物也只能以自己的身体适应自然而不能改造自然的原因。

由此可见，古猿所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为了生存就要使机能发展到一个能够对环境发生改造作用的程度，另一方面肉体结构的局限性又不允许机能发展到这种程度。这个矛盾表明，古猿已走到了纯肉体进化的顶端，它要继续发展（指向质的更高阶段的转变），就必须开拓新天地。所以，历经几千万年到今天，尚未实现向人转变的猿类的变化并不大，没有出现比猿类（除了人类）在纯肉体上更高级的动物。

但是，古猿本身不仅形成机能高度发展与肉体结构局限性的矛盾，而且也具备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条件。

古猿前肢的肉体自身直接对环境产生作用很有限，但是，在肉体结构的基础上却发展出能够掌握和运用其他物体的能力。由于具有这种能力，肉体工作器官便可利用其他物体对环境产生间接作用。这种被肉体工作器官支配而又不属于肉体自身、被用来作用于外界的物体，就是工具。工具的特点在于可以不限于一种而是可以多种多样。因此，肉体工作器官运用多种多样的工具就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作用于外界，这就不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出了只是肉体工作器官本身作用的范围，能够对自然环境产生能动的改造作用，并且其潜力是无限的。

于是，一条新路出现了：肉体器官加工具是一种不同于而又高于纯肉体结构的新物质体结构。在“肉体—工具”的新结构的基础上，古猿作用于自然环境的能力进一步获得发展，这样开展

起来的劳动就是“劳动”。劳动的特点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能动地作用于环境。因此，这种新的功能活动决不能仅仅依靠肉体结构而发生。正是这个缘故，恩格斯才指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①，“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②人类是一个具有“肉体—工具”结构的高级物质体系，古猿向使用工具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向具有“肉体—工具”结构的人类发展。所以，正是古猿本身发展中所形成的机能高度发展与肉体结构局限性的矛盾，堵死了古猿向其他生物（即仅仅是肉体结构及适应能力的改变）演变的路子，而踏上了向人（即形成“肉体—工具”新结构和劳动能力）转变的前程。

当然，“肉体—工具”结构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初，古猿运用的是天然物体工具，如现成的石块、树枝等，并且是不经常的；后来，逐渐经常化，成为生存所依赖的主要手段。这时进行的是萌芽状态的劳动。因此，“肉体—工具”的结构还不稳定。随着运用天然工具能力的发展，天然工具的局限性又被突破，开始出现最早的人工制造工具。以制造工具的出现为标志，“肉体—工具”的新结构便真正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物质形态——人类开始形成了！

“肉体—工具”结构的形成过程，不仅是工具的产生过程，也是肉体改造的过程。这都是在劳动能力发展的推动下实现的。

过去，经常把古猿使用天然工具以至制造工具进行劳动，归于自然环境变化的逼迫。应当说，环境的变化是个重要条件，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

可以促使古猿发展中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使古猿向人的转变加快。但是，若无古猿自身的发展矛盾性，环境即使再变化，也不会导致古猿变成人，而只能灭亡或者变成其他动物。所以，古猿向人的转变，归根到底还是要由古猿自身机能与结构的矛盾运动来说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一个伟大真理，它的含义就是：古猿机能向劳动能力的发展以及早期劳动的进行，促使天然工具和制造工具的产生，形成了肉体器官加工具的新物质体结构，古猿机体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发生了相关变化，从而导致了人类的诞生。

在这里，我们仅仅从劳动的出现和“肉体—工具”结构的形成这个侧面探讨了人类的起源。但是，这个侧面极其重要。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性特征，只要有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人类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物质就算开始出现了。当然，这还只是开始形成，是人类形成的第一步。

有一种意见认为，使用工具乃至制造工具并非为人类所专有。不错，从表面看，某些动物也有类似用机体之外的物体进行活动的现象。但若从本质上看，这并没有形成这类物体与动物机体的内在联系。这也就是说，人之为人正在于使用和制造工具以从事劳动，而猩猩之类的动物之为该类动物却并不在于它们偶尔使用了一些物体去活动。人类的发展正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劳动的发展，而猩猩之类的动物的进化一点也没有导致它们使用的物体的发展。有人说过，人类制造工具的关键在于利用工具造工具，即以工具为中介来实现工具的再造，其他动物则顶多只是用自己的某个机体器官（如前肢、嘴等）来“整理”一下天然的物体。这个事实的实质在于，人类运用工具去制造工具乃是工具的进化，而这种进化正是以肉体与工具的统一为前提的，这说明在人类身上

肉体与工具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结构，工具已成了人的机体的“身内之物”。与此相反，某些动物与它们使用的物体并没有形成统一整体，这些物体依然是它们的身外之物。由此可见，只从功能上认识到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还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认识到人作为一种高于生物的特殊物质体，其结构必须是“肉体—工具”，否则就认识不到人的特殊性。

古猿向人转变的因素是多元的，但有主次之分，内因是主要的，环境的外因是次要的。单就内因而言，又有主动因素与被动因素、先因素与后因素之分。古猿机能向劳动的发展是主动因素，“肉体—工具”结构的产生是被动因素。劳动的产生是先因素，思维、社会的产生是后因素。主次、能动被动、先后都在发生辩证作用。所以，探讨古猿变人的机制需要坚持辩证观点，切莫僵化。

古猿变人的关节点：文化的产生

在上一节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正是古猿进化中遇到的机能高度发展与肉体结构局限性的矛盾，促成了古猿突破肉体结构的束缚而建立“肉体—工具”新结构。这个新结构的出现即是人的形成。在这里，“工具”便属于文化范畴的事物，或者说，工具是最早的文化事物。工具的诞生便是文化的起点。工具的产生形成了古猿变人的关节点，人就是从工具的产生开始形成的。当然，人的形成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具的出现上，文化事物在人的形成中也不仅仅表现在工具方面，其他如语言、社会组织也是重要的文化现象。单就工具来讲，也经历了从“天然工具”到“人造工具”的漫长进化。正是这些文化事物的出现，又促进了人的动物躯体的进一步改造，从整体上形成了人类的完整起源。所以，人类的产

生过程也就是文化的产生过程，也是文化对人的动物躯体实行改造的过程。在人类起源的漫长历程中，各种文化现象并不是骤然出现的，无不经历曲折复杂的斗争，几经夭折才使文化因素从新生中和再生中保存下来并渐渐发展起来。

一、天然工具的使用与躯体的转变

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现已发现的化石代表，早期的可能是腊玛古猿，晚期可能是南方古猿的原始类型。

据测定，腊玛古猿生存于距今大约 1400 万年到 1000 万年前。最早发现于巴基斯坦与印度接壤处的西瓦立克山，在我国云南和东非肯尼亚也发现过这一类型的化石。从化石看，这些古猿的特征是门齿、犬齿和前血齿都较小，齿弓两侧向后张开，整个形态特征与人相近，因此，人们一般把它们归入人科，推想它们可能已初步直立行走。它们的身高约 1 米多，体重不足 20 公斤。推测它们的脑量在 300 毫升左右。

在发现腊玛古猿化石的同时，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化石，据此断定，它们是生活在森林地区。古人类学家根据腊玛古猿牙齿的形态，还推断它们是一种地面的草食者，表明它们生活在森林地区的林间空地和边缘。

南方古猿生存于距今约 500 万年到 100 万年以前，它们的原始类型可能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晚期的代表。南方古猿化石最早发现于南非（阿扎尼亚）。至今已在南非和东非的许多地方发现了大量的化石，一般分为两种类型。纤细型是南方古猿非洲种，它的身高约 1.2 米至 1.3 米，体重平均约 25 公斤，脑量平均不足 450 毫升，脑的顶叶已经扩大。粗壮型是南方古猿粗壮种，它的躯体稍高，很粗壮，体重在 40 公斤以上，脑量也稍大于 500 毫升，

小脑的外部形态较近于人。从化石看，南方古猿已能敏捷地直立行走，善于奔跑，手与人的手相接近，能使用天然工具、武器等物体。

与南方古猿化石同时发现了许多动植物化石。经研究表明，南方古猿的纤细型生活在相当干燥气候的空旷地区，粗壮型生活的地区大部分是茂密的森林。现有的资料表明，由腊玛古猿到大约 500 万年前发展成南方古猿，在大约 300 万年前，东非纤细型南方古猿中的一些进步类型演化成早期猿人，而南非纤细型南方古猿则仍持续存在了一个很长时期。另外，这时南方古猿中的若干群体开始向另一方向分化，它们的颊齿增大，身体变粗，脑子只是稍为扩大，成为特化了的南方古猿，与人属系统的成员相去愈远。

以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化石资料。仅仅依据这些化石资料，尚不能足以完整地显示古猿向人的过渡。科学家们根据这些资料，采用了积极的逻辑思考和想象的方法，对古猿向人的过渡进行了富于想象的描绘。

猿类大概是在第三纪的渐新世开始出现的，离现在已有 3000 多万年。这时的猿，体型较小，在树上生活，开始一种新的行动方式，就是用臂悬挂来移动身体，叫做臂行。它们的身体经常是在直立位置，它们的内脏也随着作了新的排列。由于长期的臂行，两腿和背脊相对地变短，骨盆和肩膀变宽，双臂增长，并使肩部从猴的朝向前方变为稍稍朝向上方。在中新世，这些猿类身材变大，数目增多，产生了许多活跃的种类。在一些地区，古猿类的一些成员开始经常到地面活动，它们臂行的行动方式为直立姿势奠定了基础。它们的四肢还没有由于臂行而过分特化，臂还不很长，腿还不很短。它们下地后，就能够逐渐直立行走，改变四肢着地的姿势。来自高等灵长类的敏捷的、活动的前肢，有更大的

自由，除用以支持身体外，还可从事其他活动。

古猿能够暂时的直立和拥有较灵活的前肢，还只是它们向人类靠拢的生物前提，但这不足以决定它们是否必定还要进一步向人过渡。决定它们进一步趋近于人类的因素，乃是对天然工具的使用。

古猿为什么要使用天然工具呢？人类的祖先本来是生活于茂密的森林中，后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迫使它们改变到地面生活。在新的生活条件下，获取食物的方式不同了，难度加大了，促使这些古猿必须进一步发掘自身的潜力。于是，它们灵活的前肢便凭其机能而从事着广泛的活动，开始运用天然的石块、树枝以及动物骨角来获取食物和抵御敌害，从而扩大它们的食物来源和生活范围。这些被古猿使用的天然物体便是“天然工具”。

古猿对“天然工具”的使用，在由猿向人的过渡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不少人持有异议，他们认为这些天然的石块、木棒不能叫做工具，理由是不少动物有类似的行为。从质上讲，古猿对天然工具的使用与其他动物对天然物体的利用尚无根本区别，但同时已有了许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古猿使用天然工具比普通动物更经常。由于环境的作用和自身的能动性，古猿利用天然物体作为谋生和御敌的手段便成为惯例，而后渐渐趋于必然。使用天然工具的必然性的证据，是手在这个时候已经越来越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其他活动主要是使用天然工具进行的活动。其他动物则没有这种必然性发展。

其次，对天然工具的使用要求有较高的智力，古猿因而开始形成形象思维，萌发了初级的意识活动，具有了较突出的能动性。这更是其他动物所根本不能具备的。

古猿使用天然工具，由偶然到经常，由惯例到必然，不仅是